

***The West As the Other: A Genealogy of Chinese Occidentalism.* By Mingming WA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4. xv, 381 pp.**

王銘銘曾奮筆疾書呼籲「中國人類學研究要有真正的創新，要從學科問題的理解中開拓新視野」（王銘銘，〈二十五年來中國的人類學研究：成就與問題〉，《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12期，頁7-13），希望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者對海外空間圈給予足夠的重視，並從人類學的視角考察「天下」到「國族」的轉變。這是王銘銘對中國當今人類學界「本土化」傾向，抑或是說「中國主義」(China-ism)已然成為主流的批判。王銘銘身體力行，以其新著 *The West As the Other: A Genealogy of Chinese Occidentalism* 作為示範，充份展開對社會科學領域特別是人類學界的反思，以及從東方的視角探討其與「他者」的關係。

這本英文新著在保持2007年中文版《西方作為他者——論中國「西方學」的譜系與意義》（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7）的敘述結構和觀點基礎上，輔以背景和材料的補充。其目的是希望通過人類學「擅長」的「他者」視角和宇宙地理(cosmogeographic)的研究方式追尋中國的「西方」觀念，以期形成對非西方視角下的「他者」的認識以及思考中國與「他者」的關係。作者將其研究置於長時段的歷史脈絡中，主要接受了法國年鑒學派葛蘭言(Marcel Granet)對「中國文明」的理論和宇宙觀的認識，借鑒了眾多中國歷史學家、民族學家、考古學家、地理學家和哲學家的本土視角，並多以二手史料為基礎，構建了其漫長而又宏大的中國的「西方學」史。

全書共分九章，除導論和結論各為一章外，其餘七章按時間順序對中國的「西方學」展開論述。書中首先講述了清朝正式派遣出國的第一位官員斌椿將瑞典女王比喻成西王母而招致嘲諷的一段故事，並以此為切入點，指出中國傳統的認識體系逐漸被近代西方主體性所取代。隨着近代西方價值觀念的傳入，中國自身的思想體系被摒棄，轉而以西方的思維方式理解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因而淪為西方思想的跟隨者(mimesis-practitioners)。對於近代西方知識霸權對東方的主導性的問題，薩義德(Edward Said)在《東方學》中做出了深刻的批判。然而，王銘銘認為薩義德忽視了東方對西方認知上的主體性，更未談及東方對非東方的認知及這種認知所具備的能力。因此，薩義德這類當代敘述模式和主流批判使得斌椿的比喻無容身之地。作者

進一步指出，人類學家格爾茲(Clifford Geertz)提出「從土著觀點看」——這種帶有「本土」視角的觀點將土著與世界全然割裂，從而忽視了土著與世界其他地方的聯繫。王銘銘認為，錢穆正確地指出了理解「西」的概念需有其歷史基礎，但卻沒有着重指出「西」這一概念的多樣性，以及依靠文字材料復原中國的「西方學」的可能性。李濟在反思了「中國中心主義」之後則描述了中國為混合民族的特點。由此，王銘銘得出自周開始，中國的「西方學」有其譜系發展歷史，且具有豐富而多元的「西方觀」的結論。

第二、三章圍繞荀勗整理的晉代出土的《穆天子傳》進行討論。《穆天子傳》講述了周穆王西行的事蹟，並被王銘銘視為第一個中國式的「西方學」，是「幻想地理」(illusionary geographies)和「現實地理」(realistic geographies)的綜合文本。穆天子沿途對山川、河流表露出敬仰和舉行祭祀，最終抵達西王母的國度。穆天子以周禮拜見西王母並獻上紡織品，西王母則饋以美玉，隨後兩人對唱歌謠。在這浪漫的西行中，周穆王的「他者」並不統一。周穆王的「他者」包括山川、河流、沿途結識的友人、物產以及代表天的西王母。而他所表現出來的態度則是「以他為上」和「以外為上」。對於穆天子「周行於天下」的「西方學」(classical Occidentalism)如何理解？王銘銘認為，它一方面夾雜了20世紀期間對「傳記地理」(biographic geography)「真實性」(authenticity)的爭論以及用神話理解地域複雜性的問題；另一方面，穆天子巡守的行為被錢穆在內的近代中國史學家解讀為處理周王與封地之間政治危機的手段（頁78-79）。

在接下來的兩章，作者將視野帶入秦漢時期，帝王的方位感從西方轉向東方，由天子巡守轉向帝王的封禪儀式，開啟了所謂的「東方的西方化」。在這個過程中，帝王一方面汲取東方「仙」與「蓬萊」的傳統，另一方面將東方的泰山賦予「西方」昆侖的意義。在「第一個分裂與鬥爭時期」（包括三國、晉和南北朝），佛教東傳與玄學融合，加上中國高僧的西行求法，共同促使中國方位觀念回歸西方。在亂世之下，家、國、天下的一體性被打破，道統喪失，士人轉而借助佛教尋求慰藉，湧現出一批如法顯、玄奘西行尋求「真義」的高僧。而在「幻想地理」的西方，超越性別的佛取代了西王母幻象，亦或是與之相融合，構成了這個時期中國的「他者」。

承接上述的討論，作者在第六章進一步指出戰國至漢的匈奴問題導致中國對「西域」的概念不斷精確化。西漢時期大量史料對西域的記載也有助於「西域」「真實地理」成分的增加。而對於匈奴問題的關注，也使中國西南地區在兩千年前就已作為東西走廊的歷史作用被忽視。另一方面，隋唐時期

帝國與周邊建立起來的朝貢體系，「將『外國』納入帝國等級社會的視野」（王銘銘，《西方作為他者——論中國「西方學」的譜系與意義》，頁92）。到了唐中葉，中國再次發生方位觀念的變革——政治經濟領域以南方為重心的南北格局形成。然而，作為「西洋」與「東洋」共同源頭的「南洋」，與「幻想地理」的西方結合，促使中國在精神信仰層面仍以印度這個西邊的方位為重。

在第七章中，安史之亂之後陸上絲綢之路受阻，海上絲綢之路隨之興盛。「西洋」一詞取代「西方」，被賦予更廣泛的含義。「西洋」的概念超越了以往所指的朝聖之地，被置於一個更廣闊的海洋空間之中，包含了大陸、海洋、島嶼、物產、動物以及人等等更廣闊的地域範圍和概念。與此同時，圍繞朝貢貿易的海上絲綢之路創造了諸多海外異域志，如趙汝適的《諸番志》、周達觀的《真臘風土志》和汪大淵《島夷志略》。另一方面，頻繁且積極的貿易往來，致使「他者」的物產改變了雙方的生活和文化，如同中國對馬和胡服的需求，一方面消除了我與他的差別，另一方面也如王國維所言異化了自我。

第八章重點討論了張星琅發展出來的「歐化過程」(Europeanization)這一概念。20世紀初，中國的「西方學」視野囊括了歐美。中國留學生和被朝廷派遣的官員肩負着對新「西方」求索的使命。面對堅船利炮，像魏源這樣的士大夫用現代的視角重新表述「西方」，並延續着中國士大夫的「天下」、禮儀和等級的觀念，繼續用東方的視角表述着「西方」。然而，到了20世紀上半葉，當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紛紛湧入中國時，「國族」主義取代了「天下」觀。作者通過中國人類學、社會學與民族學界在這個時期的發展歷程，揭示了中國對「他者」主體性認識是如何在一步步喪失，以至最終深陷歐洲中心主義泥潭。

本書可謂是一次中國觀念史的「漫長之旅」。通書以中國的「西方學」為主線，將中國歷史上對「他者」的認識以譜系的方式串聯起來，以此揭示中國對這種認識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全書始終貫穿了兩條副線，一個是「中國方位觀念的譜系」（王銘銘，〈西方作為他者書後〉，《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頁145-151），另一個是「士」在中國與「他者」的互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國古代本身賦予了不同方位豐富的意涵，王銘銘將其對「他者」認識納入到這些方位的觀念中。從西王母的西方，到東方的泰山，再到西方的佛，再延伸至歐美，中國始終對「他者」抱以「以他為上」、「以外為上」的心境。而對「西方」的嚮往，無論是穆天子的七萃之

士，還是西行求法的高僧，或是近代留洋海外的學生和被派遣出洋的官員，「士」扮演着引導帝王、定義和認識世界的角色，他們是處理中國與「他者」的關係中的探索者和思考者。儘管「西方學」之「西方」，乃是一個地理範圍並不固定且相對而言的「西方」，我們仍然可以把握中國在不同歷史時期對「他者」在方位和意義上的定位。在充滿浪漫和多樣化的西方描述中，中國的「西方學」豐富而且多樣。書中對於人類學理論有着大量的論述，並與中國歷史的神話和史實的結合相得益彰，穿梭於理論與史料之中。作者不僅成功地詮釋了非西方被研究者認識的主體性，也用他的文字證明中國人類學者在研究本土問題時所擁有的認識主體的能力，這種反思和批判無疑具有開創意義。

毛迪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Modalities of Change: The Interface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East Asia. Edited by James WILKERSON and Robert PARKIN.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3. 262 pp.

傳統人類學理論多因為對「變化」的忽視甚或遺漏而遭受詬病，無論是進化論、功能主義還是結構主義，理論所關注的主要是社會形式、文化實踐以及認同的延續性，鮮少對變化的機制進行討論。即使是那些將歷史的維度置入研究之中，也多是將變化視作一種狀態。在傳統理論中，最早觸及變化的研究者，是馬林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他考察殖民主義對地方社會的影響，注意到文化涵化(assimilation)的發生，但他也只是將之視為一種社會情境，而非當作一種社會進程。在這本由魏捷茲(James Wilkerson)與Robert Parkin合編的論文集中，以「變化」作為主線，研究範圍涵蓋東亞地區，探討傳統與現代化在東亞社會相互衝撞所呈現的樣貌。雖然如同功能論者一樣，編者視變化為社區外部因素，但卻同時強調社區成員的能動性，將這變化納入社區，並加以消化。論文集中的十個田野經驗，動態地刻劃出變化如何發生、人們又如何進行應對。

除了導論與後記，全書共收錄十篇文章，研究對象包括中國西南的少數民族群體、新興的都市移民、臺灣原住民以及越南的儂族。在比較的層面